

异化自我的人生悲剧

——《最蓝的眼睛》中布雷德拉夫夫人的后现代心理浅析

丁 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小说《最蓝的眼睛》塑造了布雷德拉夫夫人的人生悲剧。这个有着多重边缘身份的黑人女性在心理上始终滞留在幼儿的“镜像阶段”无法超越,造成了其人格的异化和分裂。本文试图从其“原始的缺失”入手,依托心理分析大师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对其建构自我的矛盾,其侵略性和其无意识的语言结构进行阐释,力图诠释布雷德拉夫夫人悲剧人生的深层心理根源。

关键词 自我 缺失 镜像 侵略性 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1-0044-03

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是一部反映黑人生活,揭示种族压迫的优秀作品,对黑人在白人社会主流文化统治下的挣扎和求索做出了深刻地剖析和阐释,发人深省,为莫里森成为广受欢迎的黑人女权主义战士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此前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的层面出发,反映两个种族的对立和冲突。而本文试图从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入手,依托著名的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探寻书中布雷德拉夫夫人这一角色的悲剧人生的深层心理根源。

一、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

“镜像阶段”理论是雅克·拉康的代表理论。所谓“镜像期”大约发生在幼儿6至18个月之间。在此阶段,尽管幼儿的身体还非常柔弱,但其视觉神经却足以发达到可以辨认出镜中的影像的程度。幼儿与黑猩猩不同,当其发现镜中的影像的时候,会对这种影像产生一种认同。起初,他把这种影像看作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物,并试图捕捉或触摸它。随后,他辨识出影像与真人的区别,不再试图触摸,而把这种影像看作是他人的影像。最后,幼儿通过对影像的观察发现这个影像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的表现,从而达到了对其自身的认同。幼儿至此就摆脱了对“支离破碎”的身体的认识,从而意识到了自我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幼儿为这一发现而欣喜若狂。“预示这个作为主体发挥作用的‘我’(I)就被突然抛到

了世间。”^[1]

拉康认为,在六个月到两岁半之间,正是这种对人的形体意象的迷恋支配着幼儿面对与他相似者的全部行动。在这一期间,一种转移性的情绪反应和叙述经常发生。打人的幼儿常说自己被人打了,看见别人跌倒自己也哭起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幼儿从镜像阶段开始就把建构自我的过程建立在了对镜像的认同之上。镜中的影像并不是幼儿自身,但幼儿却是在对其的视觉认同中发现的自我。所以,从一开始,幼儿建构自我的行为就是异化的,就是在对无数他者的认同中实现的。也就是说,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而这个对象是一种想像的投射:人通过发现世界中某一可以认同的客体,来支撑一个虚构的统一的自我感。^[2]所以,当幼儿看到了那些与自己形象相似的孩子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他”认成了“我”。

二、建构自我的矛盾

莫里森在她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主要描写了互为映衬的两个家庭。与心理健康的克劳迪娅一家相比,布雷德拉夫一家人的人生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布雷德拉夫夫人作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一员,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有益的滋养,相反却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他人的悲剧,而她自身也难逃悲惨的命运。

布雷德拉夫夫人的悲剧人生从本质上说是根源

于她的延迟的“镜像阶段”。根据拉康的理论,“镜像阶段”并不仅限于婴儿期,而是普遍的代表一种永久性的主体的结构性矛盾。布雷德拉夫夫人从小便陷入了这种构建自我的矛盾之中,无法超越。她的悲剧人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布雷德拉夫夫人,也就是鲍琳,小的时候,因为一颗生锈的铁钉而变成了残疾人,这种残缺使她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的家庭。家人出自善意的悉心呵护,使她成为家中唯一一个没有绰号的孩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趣闻轶事可供谈笑的人。她意识到自己跟家中其他成员的不同,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真正归属于这个家庭。在这个时期,她渴望从家人那里构建自我的努力失败了。家庭没有能够给她提供一个构建健康完整的自我的参照物,没能够给她一个身份定位。一方面是她残缺的身体和她被家人疏离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她渴望融入家庭,享受完整人生的愿望。在这里,鲍琳实际上(也就是生理上)的生存状态与她想像中(也就是心理上)的理想自我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是婴儿在镜像期所经历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长大的鲍琳还是处在心理上延迟的“镜像阶段”。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便是造成鲍琳悲剧的深层心理原因。

鲍琳虽然父母双全,但她却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来自父母的健康的爱。这种缺失使她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孤儿,无法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位,出现了身份危机。她渴望得到的完整的母爱便是她的“原始的缺失”,也就是拉康所谓的大写的母亲/他者(M/OTHER)。这个“原始的缺失”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所以,只能靠寻找一些小写的他者(others)来代替。所以,鲍琳特别向往健康和谐的家庭生活,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健康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员,以此来建构她的理想自我。她渴望在家庭中建立秩序,改变她现实生活中的混乱状态。她特别喜欢排列东西,把东西安排的界限分明,不容混合。这表现出她内心深处对和谐清楚的规则的向往。鲍琳一心想要使自己成为生活在健康家庭中的健全人,而她实际上所属的黑人家庭和她残缺的身体却注定无法达到那种和谐的状态。这种永恒的矛盾折磨着鲍琳,使她不得不走出家庭,去寻找一种替代,构建她的理想自我。这是她人生的第一阶段,也为她的悲剧人生奠定了基调。

鲍琳人生的第二阶段从她认识了自己将来的丈夫乔利开始。鲍琳立刻就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子,因为初次见面,他就爱抚了她残疾的脚。这个动作让她感觉到一种认同,一种对她的残缺的身体的认同。这种包容和认同比家人的善意的回避更使她安

心,使鲍琳感觉可以同乔利一起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拉康认为,“一个人自身与另一存在者的认同是一种过程,通过此过程,一种自我之连续性的感觉成为可能,并且从他人所提供的持续的同化中,那种被称为自我或人格的东西便建立了起来。”^[3]此时的鲍琳便面对着这种可能。

然而可悲的是,乔利自己也是黑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不可能实现鲍琳的梦想。他们结婚之后移居北方,北方的白人主流文化没有给他们留下喘息的机会。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负担把他本来就因为受过刺激而不健全的人格进一步压垮了。他自身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使他无力维持一个健康的家庭。而鲍琳却又把自己的梦想,对完美生活的追求,对完整自我的构建建立在乔利这个他者的基础之上,所以她的第二阶段人生也注定以不可调和的悲剧收场。

鲍琳生活的第三阶段是她从怀孕到分娩的这段时期。鲍琳刚怀上派克拉的时候,她曾经下定决心要去爱这个孩子,不管她是美还是丑。此时的鲍琳是将孩子作为了她永恒的缺失的暂时的替代物,是她这个阶段构建自我所对应的小写的他者。她渴望能通过拥有孩子来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使她能够相应的成为健康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员。然而,她在医院分娩时的遭遇彻底打碎了她的梦想。白人医生认为她们黑人妇女生孩子就像牲畜下崽子一样,不会有任何痛苦,对她不闻不问。这种侮辱和蔑视使得鲍琳意识到即使有了孩子,她也无法享受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正常生活,使得她的理想自我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派克拉在母亲眼里就变丑了。^[4]

第四阶段是鲍琳人生最后的决定期。通过看电影,接触大众传媒手段,她接受了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电影中充满爱和欢乐,井井有条的完美的家庭生活使鲍琳深受震撼。此时,电影中的家庭模式幻化为她的镜中之像,成为她构建自我的对应物,成为她因为缺失而造成的欲望主体所努力追求的对象。她进入一个白人家庭做女佣之后,这种矛盾进一步深化。白人家庭的和谐与秩序正是她内心所构建的完美自我一直追寻渴望的对象,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将她的全部热情投入到了白人雇主家中。爱白人家庭胜过自己的家庭。她将白人雇主家中收拾得干净整洁,反映出她将内心对规则和秩序的渴望寄托到了白人家里。她把自己当成是雇主家中的一员,而且,她在那里还得到了一个绰号。白人家庭的生活成了她这个阶段的“原始的缺失”的临时替代。她渴望通过白人家庭来构建自我。但是,她残疾黑人女性的多重边缘身份使得她只能成为那里的工具,不

可能得到一个家庭成员所能分享的爱和关怀。所以,鲍琳始终没有能够走出她延迟的镜像阶段,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自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使得她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鲍琳对完美家庭生活的渴望是她的“原始的缺失”。经历了四次暂时的满足之后,注定会再次失去替代的对象,从而走向死亡。鲍琳始终不能调和她构建自我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她分裂和异化的人格就是她悲剧人生的深层心理根源。

三、鲍琳的侵略性和语言结构的无意识

很多评论家认为鲍琳是造成布雷德拉夫一家悲剧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她畸形的人格加重了其丈夫和女儿的悲剧。鲍琳在家中与丈夫不停的相互攻讦,他们的相互殴打成了家中不停上演的情节。她对孩子们的漠视与对丈夫的仇视混合在一起,使得家中毫无亲情可言。但是,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家人呢?她对家庭破坏和侵略的心理根源又是什么呢?

根据拉康的理论,幼儿在认同他者中构建自我。随着这一认同过程,幼儿会不自觉地把他人的欲望当成是自己的欲望,而且会逐渐加强,进而对他人的欲望对象进行侵略性的争夺。也就是说,人的“欲望并不是欲望他者,而是欲望他者的欲望”^[5]。从这个意义上讲,侵略性是摧毁塑造自我的那种想像的一种身体形的冲动。而最强烈的侵略冲动往往产生在个人面对与自己完全相像者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死亡冲动,而拉康解释说,幼儿通过这种对与自己相似的他者的攻击,代替了自残的倾向,自我毁灭的冲动。所以,鲍琳对家人的侵略本质就在于她把自残的倾向外化到了与她同处于边缘人身份的家人的身上,通过对家人的攻讦,满足自身的自残倾向和死亡冲动。另外,鲍琳的理想自我,也就是自我建构所对应的他者是白人雇主,所以,与白人雇主争夺欲望对象也就成了她内心侵略性的自然而然的选择。对白人雇主来说,黑人就是肮脏低等的,是不值得以礼相待的,所以,鲍琳对家人的态度也就同样如此了。

另外,语言对于无意识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拉康认为,无意识有着类似于语言的结构。他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引入了心理分析领域,形成了著名的“漂浮的能指”和“移动的所指”的概念。(S/s)大写的S代表能指,代表意识,小写的s代表所指,代表无意识。无意识潜藏于意识之下,但却又不时地会在语言结构的缝隙中流露出来。

无意识有着类似于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法则。索

绪尔的语言学提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一个能指始终追逐着所指的过程。而拉康也指出无意识也同样是一个能指追逐被压抑的内容的过程。而无意识的功能法则也与语言的转喻和换喻相同,就像弗洛伊德所提到的“缩聚”和“移位”一样,可以通过一种相似性和空间联系来分析无意识。而弗洛伊德也指出,无意识的概念可以有各种观察角度,各种表现形式,所以梦,语言 and 精神的障碍状态都可以成为无意识的表现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鲍琳的语言正是她无意识的显现,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没有多少话语。话语的稀少混乱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后来在她怀孕期间,因为其在孩子身上找到了认同感,使得她很乐于同婴儿交谈。随后这种认同感又被白人文化所摧毁,她就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此外,在她自己的贫穷、破碎的小家庭中,鲍琳的语言也是时断时续的,甚至在她与丈夫打架的时候,她也是沉默无声的。而当她进入白人雇主家中,与白人小孩交谈的时候,她的语言却又变得流利自如。这完全反映出她的内心状态,反映出她自我构建中的矛盾,反映出她所追寻的理想自我只能在白人雇主家中才能得到虚假的满足。

四、结 语

《最蓝的眼睛》中的布雷德拉夫夫人是莫里森所塑造的第一位悲剧黑人女性,虽然她的遭遇根源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可以说他们“一家是自我仇视的种族主义文化的受害者”^[6]。但是,她无力直面现实,在心理上徘徊于延迟的“镜像阶段”,却是她导致自我的异化和分裂,产生侵略性,从而走上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1] LACAN J. Ecrits A Selec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7.
- [2]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53.
- [3] 玛尔考姆·波微·拉康[M]. 牛宏宝,陈喜贵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1999 :34.
- [4]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6.
- [5]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M]. 季广茂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27.
- [6] DUVAL J N. 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M]. New York :Palgrave,2000 :21.